

政策支持、企业投资、农牧民参与、技术创新，库布其——

沙里生金 荒漠添绿

本报记者 吴勇

12月15日，生态环境部命名表彰了全国第二批1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其沙漠亿利生态示范区位列其中。

数据显示，经过几十年治理，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面积达到900多万亩，沙漠的森林覆盖率由2002年的0.8%增加到2016年的15.7%，植被覆盖度由2002年的16.2%增加到2016年的53%，年降雨量也由不足100毫米增长到400多毫米，与之相应的是沙尘天气骤减。

更重要的是，库布其沙漠不仅告别了黄沙肆虐，还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生态和经济资源。

鄂尔多斯市在治沙历程中逐步探索出“政府、企业、社会共治”的发展模式，引入市场运作和利益共享机制，将绿起来与富起来、企业发展与生态治理等相结合，让治沙有了持久动力。

发展治沙产业，治沙有了内生动力

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是一个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小村庄，这里曾经有近900户人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为沙害走得只剩300多户。

后来，鄂尔多斯开始施行“五荒到户、谁造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引导个人和企业参与治沙。

1986年，村民高林树从80多公里外用3只羊换回一驴车沙柳，成为官井村种树的第一人。1990年，高林树在成活的800亩沙柳中间套种的麻子收获了，当年就卖了1.5万元。当时当地年平均收入仅有300元左右，高林树一家从过去吃不饱饭的贫困户，一跃成为村里第一个万元户，其他人也纷纷效仿。

干了一辈子林业工作，退休后到亿利资源集团的治沙技术研究院担任总工程师的吕荣告诉记者，“我们也走

核心阅读

把沙漠变为绿洲，有多难？让吃不饱饭的贫困户脱贫致富，又有多难？在内蒙古的库布其沙漠，这两件难事都做成了。

通过产业化治沙，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治沙的积极性，库布其治沙有了持久动力；借助科技的力量，从沙漠中“掘金”，农牧民从中受益。

过弯路，原来单纯依靠投入资金来植树种草、治理沙漠，收效甚微，后来逐步在政府的引导下发展沙生作物经济，治沙才真正有了起色。”

“种下甜根根，拔掉穷根根。”这是当地种甘草的农户编的顺口溜。曾经的贫困户吴直花告诉记者，亿利集团负责种苗供应、技术服务、订单收购，农牧民提供土地和种植管护，“一年能有3万来块钱收入，环境也一天天好转”。

进入新世纪，鄂尔多斯又出台了禁休轮牧、生态治理等奖补机制。“现在全村有19万亩林地，生态改善了，收入增加了，近3年有近30户村民又搬回这里。”高林树的儿子高二云告诉记者。

“尝到甜头的百姓，是库布其治沙事业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鄂尔多斯林业局局长韩玉飞说，“具有造血功能的治沙产业，是沙漠得以改造的重要助力。”

换一个角度看，沙漠也是一种资源

引入企业进行生态建设，让企业从治理沙漠中获得收益。这是鄂尔多斯市探索的一条治沙经验。

亿利集团从1988年开始在库布其治沙，逐步走出大规模改良沙漠土地的路子。“沙漠虽然可怕，但换一个

角度来看，沙漠也是一种资源。”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说，“库布其的成功，在于以技术为核心，从沙漠土地、阳光、生物质、沙材料及周边煤炭资源中“掘金”，通过产业发展反哺治沙。”

亿利集团通过长期与沙区群众合作，成功试验多种在沙漠种植植物的新栽培方法，并加以推广，利用不同品种沙生植物的特性进行生态修复，通过产业化方式应对和防治荒漠化。在库布其，像王文彪一样从事治沙产业的企业家还有很多。

据了解，鄂尔多斯市治理沙漠先后投入300多亿元的产业化资金，创造出生态修复、生态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六位一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生态产业体系，使沙区人民脱贫致富，为治沙赋予了新的内涵。

据介绍，鄂尔多斯全市参与治沙造林及其相关产业开发的企业数量达到了80多家，培育了自治区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4家、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2家。年生产人造板2.6万立方米，生物质发电3.1亿度，杏仁露、海红酒、沙棘等饮品3.5万吨。

农牧民从治沙中获益，收入多元化

临近中午，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

图嘎查，牧民高娃的“牧民之家”坐满了等待用餐的游客。

12年前，乌兰一家作为生态移民，从沙漠腹地搬迁到嘎查新村，原来的沙区成了旅游区。“现在我每年至少能接待2000多名游客，旅游收入十来万元。”她粗略算着账。

2006年，道嘎查将分散居住在沙漠腹地的36户156名牧民搬迁到牧民新村，牧民从依靠放牧为生转而搞起了旅游。嘎查支部书记达楞其格告诉记者，此前，这36户牧民是嘎查最贫困的人群，但搬出沙区搞了几年旅游后，他们成了全嘎查羡慕的对象。牧民新村36户牧民从2006年人均收入不足1万元，增长到户均收入达12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企业通过租地到户、包种到户、用工到户的模式，充分调动了当地数十万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出租土地、参与治沙产业，农牧民以市场化的方式参与到经营活动中，拥有了“沙地业主、产业股东、旅游小老板、民工联队长、产业工人、生态工人、新式农牧民”等新身份，每一种新身份都能带来不菲的收入。

据统计，库布其沙漠周围先后组建了232个治沙民工联队，5820人成为生态建设工人，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近1500户农牧民发展起家庭旅馆、餐饮、民族手工业、沙漠越野等，户均年收入10万多元，人均超过3万元。

鄂尔多斯市副市长石艳杰说，库布其模式的核心内涵是政府政策支持、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和技术持续化创新，治沙、生态、产业、民生四轮驱动，平衡发展。“产业化的治沙模式让治沙本身具备了内生动力，但依赖政府补贴的产业项目培养不出在商海中的‘游泳能力’，只有真正实现‘绿富同兴’，让沙漠的进一步治理取得持久动力，才能真正治理好沙漠。”她说。

美丽中国·资源枯竭城市绿色转型③

“再过几年，这果园就能成为我的小金矿！”看着一人多高的果树，姚金理憧憬着。姚金理是陕西铜川耀州区一二三道沟区域刘寨村村民，五年前他狠下心，挖掉了自家的苹果树，“满树都是尘土，果子卖给果汁厂人家都不要。”

不过，一二三道沟区域治理开始后，姚金理发现空气好了。去年，他重新在沟沿地里栽了果树。

铜川是一座因矿而建、因矿而兴的城市，高峰期煤炭开采企业一度达到500多家，水泥企业30多家，建筑石料加工企业400多家。不过，铜川也付出了环境代价：废弃煤矿满目疮痍，石灰石矿山体裸露，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2009年，铜川市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生态修复治理随之加速。

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环境治理有了转机

“随着旧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我们迎来了经济转型、生态修复的好机会。”铜川市委书记杨长亚说。

铜川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后，铜川市委、市政府抓住机会，组织编报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实施方案，三年累计争取到中央支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专项资金2.9亿元。位于王益区市区宜园路东侧的桃园煤矿废弃矸石山综合治理项目是其中之一。

顺着修好的石阶往上爬，铜川市国土资源局王益分局局长袁保民说，“山上种的最多的是紫穗槐，近26万株，最适合土质松散的坡地地面。”通过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占地84亩的矸石山全部实现治理，其中绿化面积达到67.5亩，总投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021万元。

眼前的桃园煤矿废弃矸石山再没有了往日的脏乱差，地质灾害隐患消除，环境改善，山脚下修建的广场还成了周边群众的娱乐场所。

李爱敏是桃园煤矿矿工家属，住所距矸石山不足500米。周末午后，她正带着孩子在广场踢足球。“没治理前，矸石山寸草不生，出门一天，白衣服就成了黑衣服，一刮风飞沙走石，常年不能开窗。”李爱敏说，“现在我常和邻居在这儿跳广场舞，孩子们也有了玩的地方。”

据了解，这笔中央专项资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2.31亿元，共支持了17个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目前有9个项目已经竣工验收，8个项目仍在进行中。

关停煤矿，劝退采矿企业

一座城市想要蜕变，仅靠治理几座矿山是不够的，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煤炭的开采，不仅会造成沉陷区、采空区，还会对地下水系造成破坏。这是影响

生态修复化危为机

铜川『煤城』变美了

本报记者 张丹华

城市转型和生态修复治理的难点。”杨长亚说。

借助国家煤炭去产能政策的契机，铜川关停了质量不高、破坏生态的一批煤矿，仅2016年就关停了21家煤矿，煤炭去产能1058万吨，占全省年度去产能总量的36%。

2017年1月，又一个政策红包“砸中”铜川——铜川成为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试点区之一。

耀州区石柱镇经济服务站站长王奔锋被抽调来，负责一二三道沟的生态修复工程。前期的重要工作是劝退采矿企业。有一位矿主，坚持不拆矿，施工时要么躺到铲车上，要么站在挖机斗里。“我找他的熟人跟他谈，前后跑了两个多月，最后终于谈妥了。”王奔锋说。最终，工作小组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政策约束、经济补偿等方式，劝退了全部34家采矿企业。

杨长亚给出了一组数据：经过核算，仅2016年关停的21家煤矿就拉低了铜川市4个百分点的GDP。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截至今年10月底累计投入了26.91亿元。

“收入在减少，支出在增加。但城市发展不能只看GDP，更要看百姓的生活质量。”杨长亚又给出了一组数据：2017年，铜川人均水资源为303立方米，2015年为276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270天，比2016年增加40多天。

加强制度保障，优化修复技术

为了夯实生态环保责任，铜川市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把环保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制度在产生约束的同时，也激发了领导干部的内生动力。”铜川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鲁宁说。

对未来的治理，刘鲁宁感到治理理念和施工技术还有提升空间，“一些修复工程用的是工程手段而不是生态手段，比如，有条河道治理把河搞成了渠，修的堤坝用的是水利防洪的水泥坝，水生态系统和周围的土壤去交换就会变质，这样的工程需要重建。”

生态修复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工程。据统计，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总投资达到58.63亿元。对于需要后期维护的河道项目，铜川市引入PPP模式，既解决了当下建设资金短缺难题，又有专业的团队负责长期运维事宜。

去年，全市实施的18个子项目中有7个采用PPP模式，占项目总数的39%。“我们设置了全生命周期的绩效考核办法，并将其与付费挂钩，此举有助于提升第三方长期运营维护的质量。”刘鲁宁说。

前11月全国环境行政处罚金额达136亿元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寇江泽）25日，生态环境部通报各地2018年1—11月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与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的执行情况：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共下达处罚决定书166210份，罚没款金额为135.97亿元，全国实施五类案件总数为36302件，比去年同期增长1.78%。环境行政处罚力度较大的省份为：江苏、广东、河北、山东、浙江。其中，江苏（19.73亿元）、广东（15.37亿元）、河北（12.53亿元）、山东（10.25亿元）罚没款金额超10亿元。

全国实施的五类案件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691件，比去年同期减少33.94%，罚款金额9.85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41%；查封、扣押案件19903件，比去年同期增长21.15%；限产、停产案件6196件，比去年同期减少20.99%；移送行政拘留7145起，比去年同期减少8.71%；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2367件，比去年同期减少6.18%。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案件数量较多的为江苏、广东、安徽、浙江、福建、陕西六省。

长沙实现小微水体河长全覆盖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赵永平）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系，打造“安全的河、干净的河、美丽的河”，湖南省长沙市从大江大河到小微水体，责任全覆盖，打通“最后一公里”。岳麓区以桐木—曾家桥片区为“试验田”，打造莲花现代农业公园小微水体管护样板区。小微水体主要指流动性较差的小河小溪、小沟小渠、山塘水库等，规模虽小，但数量庞大。“抓小微水体管护，就是要把一根根‘毛细血管’管起来，源头治理抓到底、抓到位。”长

沙市水务局局长曹彪有本账：全市统计在册的小微水体有16.03万处，设立市级河湖长10名，县级河湖长107名、乡级河湖长875名，村级河湖长2461名，村管小微水体片区河长5462名，确保了所有水体责任全覆盖。今年长沙增加小微水体数量7259处，增加蓄水能力2000万立方米，新增（改善）高效灌溉节水面积3.35万亩。有了水，长沙实施库塘相通、河道畅通、水系连通工程，逐步恢复库塘、河湖、湿地等各类水体的自然连通，使河相交、湖相通、水相连。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POSTAL SAVINGS BANK OF CHINA

进步 与您同步

发展绿色金融

建设美丽中国

客户服务热线: 95580

网址: www.psbc.com

股票代码: 1658.HK



扫一扫了解更多